

多元和统一交织的法兰西图景

庄馥菁



安托万·布兰查德《巴黎街景》

《法国通史》(六卷本)
沈坚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出版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浙江大学沈坚教授领衔主编的六卷本《法国通史》。该通史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线,向读者呈现出历史上法国以及法兰西民族观念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整套通史主题鲜明,框架清晰,不仅有利于广大法国史爱好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与中国虽相隔万里却情谊深厚的国度,而且在视角、方法、观点等层面,为国内的法国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法国是现代民族主义谱系最易识别出来的国家

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民族情感,在法兰西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在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的发展史中,法国是现代民族主义谱系最易识别出来的国家(《民族、国家与暴力》,[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这一系列鲜明的特征,首先与法国“得天独厚”的环境和资源密切相关。法国位于亚欧大陆西部,不仅和多个欧洲国家接壤,而且临近多个海域。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拥有较为广阔和完整的领土,而且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尽管不同地区的地形和气候具有多样性,但总体而言这是一片宜居的土地。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前,法国一直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除了“大自然的馈赠”,法兰西共同体的形成同样得益于语言和文化的延续性。随着843年《凡尔登条约》的签订,加洛林帝国一分为三,其中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王国便是法兰西的雏形。相比于东法兰克和中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几乎全部属于广义的罗曼语族,与拉丁语的差距相对较小。这种语言相似性,使得君主敕令、主教法令等行政文书在西法兰克王国更有条件得到广泛运用。同时,查理曼和虔诚路易使用的、旨在加强地方控制的“巡查钦差”制度,在三个王国当中也唯独在西法兰克王国得到沿用。更重要的是,秃头查理还继承了加洛林家族的君权意识形态,将它贯彻到对西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当中。此外,基督教也对法兰西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卡佩王朝时期,法兰西国王们将“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称号从罗马教廷那里成功借取,借助基督教证明自身之于其他诸侯的优越性,以及通过血缘继承王位的合法性(《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湖北成校,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这些因素,为法兰西王国的诞生和王权的增强奠定了基础。

绝对君主制对近代法国的影响

此后,法国经历了以王权为中心的领土聚合过程,建立了君主制民族国家。随着王权不断增强,法国的君主制也从等级君主制转变为绝对君主制。

法语“绝对主义”一词首次出现于1797年,意指“纯粹的”“不含杂质成分的”(《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因此,绝对君主制就是“不含有任何民主政体或者贵族政体成分的纯粹政体”。事实上,绝对君主制正是通过遏制“中间团体”的方式,使自身得以巩固;国王拉拢市民阶层,以此激发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遏制贵族权力、增强王权的目的。与不断增强的绝对君主制相伴而生的,是不断完善的国家官僚系统和地位日益重要的首都。法国的首都巴黎,自近代以来也便成为国王的驻地和国家管理体制的“胚胎”。

对于绝对君主制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应当承认,它增强了近代法国的国力和影响力,并推动了法兰西民族观念的发展。日趋完善的官僚体系使法国犹如一台零件精密并且高效运转的机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办事效率;在国家的培育和支持下,近代法国形成了璀璨的古典文化和优雅精确的语言,从而迅速上升至欧洲“文化先行者”的地位;对首都巴黎的重视和大力建设,在早期同样催生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兰西的意识和情感。但另一方面,绝对君主制也对法国造成了负面影响。当君主政府成为社会唯一的驱动力时,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便遭到了压抑;当国家在理性的指导下,将最大效率和最优结果视为目的,从而集中力量有针对性地采取举措的时候,主流声音、首要利益之外的其他声音和诉求便遭到了忽视甚至遏制;当社会自治组织不复存在,各群体直接与君主政府建立联系时,社会内部便缺乏良性互动;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缺乏了解以及良性互动,绝对君主制下的治理模式也就埋下了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分裂的种子。

这种内部冲突和分裂,首先体现在法国的民族观念发展历程当中。随着民族观念逐渐增强,形成了系统的民族话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兰西民族观念和话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则是不同群体的“话语权之争”。卡佩王朝时期,国王将自己打造

成“虔诚的基督徒”,并将此解读为法兰西的独特性;随着王权和中央权力不断增强,“法兰西”的含义从国王和宗教的联系,逐渐被解读为国王和国家的联系;18世纪,贵族把自己界定成法兰西民族,为自身的存在合理性进行辩护;法国大革命期间,第三等级将自己定义为“真正的法兰西民族”;到了19世纪中叶,工人同样视自己为法兰西民族的代表。在内容方面,18世纪以来的法兰西民族话语都强调“团结”,并且都蕴含了“普世主义”的梦想。然而,藏在“团结”图景和“普世”梦想背后的真相值得玩味:事实上,每一个群体都将自身等同为整个法兰西民族,但这些群体都是通过树立“敌人”、借助共同的仇敌情绪来实现联结的:通过共同反对国王,法国贵族们建立了联结;通过共同反对贵族,广大第三等级的成员建立了联结;通过共同反对资产阶级,法国工人们建立了联结。因此,每个群体的“敌人”,在该群体的话语当中也就变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敌人”;当一种民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时,便意味着其他群体的“失声”。法国内部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因民族观念和民族话语的发展而得到根本解决。

内部冲突和分裂,同样体现在18世纪末以来法国的政治环境当中。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后,法国便在立宪君主制、共和制和帝制之间不断变换,直至第三共和国时期才基本稳定在共和制的轨道上。促成法国政体频繁更迭的原因,同样在于多元政治势力的并存,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正如一种民族话语取代了另外一种民族话语,用一个政体取代另外一个政体,成为法国人解决眼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办法。而不同政体“轮回式”更迭的情形背后,实际上是尘封的法兰西记忆被轮番“唤醒”,以及一度被压抑的声音重新争得表达的机会。

通过历史书写来弥合国家和民族的“裂隙”

冲突和危机不断的环境,反过来

也模糊了各群体对法国和法兰西民族的记忆和身份认同。应该认同哪个时期的法兰西,又应该认同哪个群体的法兰西?追溯并书写法兰西历史,成为人们探索这个问题的重要手段。法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自腓力二世时期开始,国王就将书写历史作为捍卫王室利益的手段;蒙洛西耶通过撰写《论法国君主制》,为贵族群体发声;梯叶里书写的法国史,则捍卫了第三等级的利益。这套六卷本《法国通史》编者指出:历史书写除了被不同群体用来捍卫自身的利益以外,同样被用来弥合国家和民族的“裂隙”,这其中又以拉维斯和诺拉的例子最为典型。拉维斯主编的《法国史》采用“全景式”的视角,将“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史和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史相结合,并将共和理念贯穿始终,从共和的角度系统地重建“旧制度”时期的历史。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则列举了一系列供法国人自愿存放记忆的“场所”,通过阐述这些“场所”的特殊意义及其背后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开展民族历史书写的尝试。倘若拉维斯希望《法国史》增强法国人对“整体的法兰西民族”的认识,从而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那么《记忆之场》则旨在透过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的张力,呈现出更加多面的法兰西形象。

回顾法国和法兰西民族观念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它们拥有较为清晰的主线,主线的背后则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有连续性,也有断裂的插曲;诠释法兰西特性的,既有耀眼的巴黎,也有其他各具特色的城市和地区;组成“法兰西人”的,则是每一个鲜活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体和群体。多元的特性声音并不会使法兰西的特性变得模糊不清,因为它们始终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组成部分。包容的心态和敏锐的感知力,既有助于法兰西认识过去和当下的处境,也有助于中国读者在法国古今之间、在中法之间进行思考和互鉴。这也是六卷本《法国通史》最大的意义所在。

食物,联接着中国农村的现代性变迁

周云水

些内容,读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以及食物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食物作为具有族群特征的文化符号,常常被用作强调“我群”文化、划分族群边界的工具。客家山居生活的艰辛,让勤劳俭朴的客家人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恩赐,采集野生植物块茎和种植五谷杂粮,或晒干或腌渍储存以备不时之需,以“素、杂、粗、野”的食材来源,创造出客家菜“咸、肥、香、烧、熟、陈”的特色。有趣的是,欧爱玲观察到客家人对“食酒”与“食饭”的严格区分。“食饭”是吃米饭,专指日常饮食。参加宴席即使不会喝酒而只是吃饭,但却是“食酒”。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用餐喝酒,因为没有外人参加,却仍属于“食饭”。“食”字在常规性的现当代中国通用语言中常用作动词,但在本书里更多的是作为动词,并凸显古汉语里“吃”的意思,也就是现代客家话里仍在使用的“吃”的意思。客家方言是中国南官话的活化石,保留了许多古代的字和发音,比如书中提到的“板”“食早”“食昼”等。作为一位外国学者,欧爱玲愿意花20多年的时间,对客家文化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展示了食物如何作为社会和文化的纽带,连接个人与家庭、社区与现代社会,不仅详细描述客家食物的传统制作方法和风味,还分析食物在节日、庆典和家庭生活中的特殊意义,以及食物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的社会互动。通过这

食物很多是圆形或球形的,比如肉圆、鱼圆、芋子圆、煎堆等,意味着团团圆圆的好意头,尤其是逢年过节,颇为讲究。“板”是如此,“酿”也是如此,酿豆腐就是球形的,是某些客家地区年夜饭必备的菜肴之一。客家糕点也运用了“酿”这个方式,将花生芝麻等馅料,混进艾蒿或鸡爪藤等其他野菜和糯米混合而成的糍粑里,做成有馅的“艾板”,作为清明的主要美食。

欧爱玲对中国文化充满热情,她的研究不仅涵盖食物经济的广泛领域,更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食物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比如梅州城郊的月影塘,这个曾经的农业村庄,如今正经历着向混合经济的转型。水稻,曾经的贵族作物,与红薯——穷人的食粮,共同见证村庄从贫瘠到富足的转变。书中不仅记录了洋葱、中国白菜和其他蔬菜、水果的种植情况,更通过生产统计数据,展现了农业的变迁。如今,随着年轻人纷纷离乡,寻找更为轻松且收入更高的工作,农业逐渐成为老年人的坚守。

在中国文化中,食物与节日、仪式紧密相连,是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月影塘村的人们通过食物的赠送、交换和共享来维系社会关系和道德义务,尤其在家庭和亲属之间。社交交易中的食物流通,如同润滑剂一般,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互动。无论是一杯茶的简单款待,还是分娩后母亲所食用的滋补食物——娘酒鸡,都体现

了食物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从帝制到民国,再到社会主义政府的巨变,月影塘也经历了从贫瘠到富足的转变。如今,这个小村庄不仅能够享受到充足的猪肉和蔬菜,甚至连曾经奢侈的海鲜也成了家常便饭。月影塘的传统和变化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样本。

食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标志,重要到没有人可以忽视它,它往往承载着社交信息。上菜的内容、方式、客人的座位安排、嘉宾的尊贵程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都在食物的制作与消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甘苦同食》中,欧爱玲以饮食为轴线展开写作,但最终落脚点在中国乡村社会上。翻阅本书,读者可真切感受到工业化与都市化给乡村饮食、农业社会人情带来的影响,触摸到中国人忆苦思甜的历史惯性。

《甘苦同食》是一部对中国食物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的书,也是给那些对中国农村文化和社会变迁感兴趣的读者的一份珍贵礼物。它不仅记录了中国农村的食物文化,更通过食物这一窗口,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现代性探索。欧爱玲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分析,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农村形象。她以西方学者的视角关注粤东客家村落的社会文化变迁,诚如她所言,纵使风云变幻,人世沧桑,食物具有的“联结性”和“地域感”,仍将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从「肉食」到「食人」

细读韩江《素食者》

「韩」鲁贞银

韩国女作家韩江的《素食者》向我们讲述了三个看似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紧密的故事——“素食者”“胎记”“树火”。从2000年代中期这部作品问世,到2016年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再到今年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与韩江的其他作品相比,《素食者》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作品。在小说中,主人公英惠因拒绝肉食,而选择逃避日常生活。由于此段叙事过于晦涩且略显极端,导致大多数的文学批评家和读者都表示难以理解英惠的行为。但实际上,韩江在小说中刻意回避了英惠的视角,每个故事都是在他人目光注视下展开叙事的——“素食者”中英惠的丈夫“我”、“胎记”中英惠的姐夫“他”、“树火”中英惠的姐姐“仁惠”。在这样的叙事视角下,“他者化”的英惠没有机会为自己行为进行辩解,读者也只能在他人的目光中寻找解释英惠行为的蛛丝马迹。

韩江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了误读主人公英惠的可能性,并反复强调英惠不是单纯的牺牲者。在她看来,英惠是一个“为了抵抗暴力可以豁出性命的人”,是“坚持与人性黑暗斗争到底的存在”。

《素食者》中的“食物”和“进食”,是韩江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母题,主要表现为主人公“拒绝”或“过度摄入”“食物”的行为。例如,在《你冰冷的手》《起风了,出发吧》中,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进食障碍”,实际上是通过“暴饮暴食”或“厌食症”等方式来表达对世界的厌恶和愤怒,并试图以此构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进食障碍”成为女主人公重塑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路径,在这一过程中,“进食”作为与世界沟通的主要媒介,其外延得到了扩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去关注,韩江在作品中如何通过拒绝“进食”这一行为来建构女性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讲,《素食者》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空间——那个丈夫口中“世界上最平凡的女性”英惠,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反抗“他人”眼中这一卑贱角色的,而女性的这种反抗又会给蔑视她们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冲突和变化。

反复出现的噩梦是英惠对肉食表现出强烈反抗的主要原因。梦中那些可怕的杀戮场面,让她感同身受无法忘记。在记忆的尽头,是小时候与父亲相关的一个场景。一天,家里饲养的狗咬伤了父亲,盛怒之下的父亲将它吊在摩托车上,残忍地杀死了它。通过关于英惠记忆的叙事,我们可以推测英惠噩梦和恐惧的根源或许就是她的父亲。父亲把在越南战场上杀人的旧事当作英雄事迹,天天挂在嘴边炫耀。但对于英惠而言,对杀人的恐惧足以给年幼的她留下心理阴影。在英惠结婚后,父亲的权威则转移到了她丈夫的身上。英惠的丈夫把她当作满足自己食欲和性欲的工具。在英惠看来,父亲和丈夫是作为同一个肉食共同体,对他们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惠的恐惧的那段叙述中,她的恐惧并不来源于这个肉食共同体,小说敏锐地关注到一个旁观者“面孔”。那是一副血肉模糊的“面孔”,目睹了父亲杀狗的全过程,却无动于衷。之后,又大口快乐地享用起散落在地上的肉块。那副“面孔”反复在噩梦中出现,英惠对此感到熟悉却又陌生。最后,英惠终于意识到,那副“面孔”就是第一次看到自己时的模样。在此之后,英惠总有一种错觉——自己杀了人,或者说自己想要杀害她,并因此陷入到无休止的困惑中。换言之,英惠之所以会对肉食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与其说是对肉食或暴力的恐惧,不如说是对“杀戮心理机制”的一种自觉——自己虽然拒绝肉食,但实际上与其他肉食者一样,曾经吃过肉,也是一名施暴者。

英惠的这种自觉,让我们不禁联想到鲁迅《狂人日记》中的“食人”叙事。狂人对于“食人”的认知过程与英惠对于“杀戮心理机制”自觉过程十分相似。在《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哥哥和其他村民所组建的“家庭共同体”,以及维持这一“家庭共同体”的根本动因便是“食人”这一暴力行为的内在化过程,并且随着这一认知内在化成为“家庭共同体”的日常行为准则后,便难以察觉到它的不合理之处。正如英惠妈妈说“现在你不吃肉,世人就会把你吃掉”,“家庭共同体”会将拒绝共同准则的人驱逐到“正常”会将拒绝共同准则的人驱逐到“正常”的环境之外,强行将这个例外关到精神病院中或者囚禁在封闭的房间里。但对于如何摆脱这一处境,狂人和英惠选择了不同的路径。狂人认识到不能改变哥哥和家人而走向了绝望,英惠则选择通过自残等斗争行为进行反抗。

英惠意识到自己也曾是一名施暴者,无意识地与其他肉食者一起吃过肉,并因此感到极度的不适和恐惧。但她并没有止步于此,她清楚地认识到单纯地依靠拒绝肉食这一行为是无法摆脱噩梦束缚的。因此,面对家人不断强迫自己吃肉,她选择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来表示反抗。她发出野兽般的尖叫;小露的重要作用。



《素食者》
[韩] 韩江 著
胡叔简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丈夫要求她做一个好妻子时,咬住家里饲养的宠物鸟,向丈夫示威。

英惠不惜自残,也要将自己从暴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素食者》的第二个故事“胎记”中,英惠选择了通过接受与姐夫发生性关系来破坏现有的自己,是因着幻想着自己可以变成一株植物。而在第三个故事“树火”中,英惠坚信通过幻想自己成为一株植物,能摆脱噩梦的困扰;后来又通过拒绝食物,来表达自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达成夙愿的决心与意志。此外,英惠对于摆脱暴力的渴望,不会因她的死亡而结束,而将会在姐姐仁惠的生活中得到延续。仁惠一直扮演着一名好妻子的角色,即便亲眼目睹了自己丈夫和妹妹的出轨行为,依旧选择了默不作声。但在看到妹妹在精神病院所遭受的痛苦之后,仁惠也开始做起了和英惠一样的噩梦。这说明仁惠已经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也是一名旁观的施暴者。

在“树火”的结尾,面对英惠因拒绝医护人员救助而与医护人员厮打的场面,仁惠突然咬伤了医护人员,代替英惠阻止了他们。而当仁惠抱着全身痉挛的英惠,坐着救护车驶向精神病院时,姐妹俩才真正迎来了解放的时刻。但在这一过程中,仁惠注意到,作家韩江在构建英惠和仁惠两位女性之间的联系时,没有选择相对收敛的“和解”或“恢复”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传递反抗”这一形式来实现她们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从此刻开始,英惠的反抗意识将转移到仁惠的人生中,并得到延续。事实上,韩江曾打算在第三个故事“树火”之后,再从仁惠儿子智友的角度出发,写一个关于英惠和仁惠的故事,但最终没能写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部小说《起风了,出发吧》。该作品讲述了女画家仁珠离奇死亡的故事。在故事中,男性评论家姜锡元极力歪曲仁珠的人生,而另一个女性——贞姬则坚信自己心目中仁珠的形象,并因此与姜锡元展开斗争。实际上,韩国评论界对2000年后韩江的作品颇有赞美之词,称其作品中表现出了“无法弥合裂痕的新女性形象”,她们通过身体叙事开创了韩国女性文学的新美学尝试。但如果我们再去看韩江在《素食者》之后的《少年们》《不做告别》等几部作品,便可以发现韩江在《素食者》中的尝试不仅在于对女性的形象化讨论,同样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边缘人或少数人的普遍性美学探索。